本卷导言

在中国封建教育制度史上，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教育制度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汉代“独尊儒术”文教政策受到威胁，封建中央集权制分崩离析，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佛教和道教思想泛滥，世家豪族政治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实施儒家教育为主体的教育制度受到极大的冲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蕴蓄着改革的风云。隋代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混乱纷争局面，统一了中国，重新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在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同时，隋代统治者进行了教育制度改革，使教育制度能够很好地为社会服务。隋代统治者承袭魏晋南北朝的教育制度而来，建立了比较系统和合理的教育体系，确立了与政治和经济改革相适应的教育制度，为李唐王朝以及后世的教育制度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借鉴。李渊父子建立了大一统的唐帝国后，在政治上面临着如何运用整体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方针的问题。然而，自汉代以后，儒学受到内外两方面的矛盾冲击而衰落，造成魏晋南北朝400年的思想大动荡，使儒学的权威地位受到动摇，无法以统一的、整体的思想体系为大一统的唐帝国服务。贞观君臣对儒学的政治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极高的评价，把儒学视为治理国家最有效的政治思想武器。唐代统治者建立了系统、完善的教育制度，确立了尊圣崇儒的文教政策，提高了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健全和完善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给唐以后的封建王朝树立了稽式和楷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多元、经济衰颓、思想繁杂、民族融合、战争频仍的历史时期。在近 400 年的时间里，统一的时间不足 1/4。教育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的安定环境，但是，社会的动乱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教育的极度动荡和极度不稳定，原有的教育制度受到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当时大部分政权的寿命都比较短暂，而且大都处于不断的内乱和外患之中，官学教育制度便只能在不安和动荡中风雨飘摇。有人用“时兴时废，若有若无”来形容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教育的衰败，是很贴切的。

儒学的衰落表现在两个方面。就儒学自身而言，儒学教育的内部分歧，削弱了儒学的权威性：

第一，派别之争。汉代儒学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两派内部又有着师法和家法之分。在西汉时期，两派斗争激烈，有过 4 次大的论争。

第二，内容各异。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各以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去解释儒家经籍，而且，为了维护自己学说的尊严，各儒学大师又树立起森严的师法和家法，从而造成了儒学教育内容的混乱局面。

第三，臧否政治。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士人品评政治、臧否人物，反映出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与封建王权的矛盾。

第四，南北分经。南朝经学受玄学影响较多，北朝经学多重章句。在儒学内部，东汉时期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对儒学教育予以强烈的震撼。就儒学的外部环境而言，魏晋玄学的泛滥，对“名教”、封建等级制、六经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佛教的传播，在思想上也是对儒学教育的挑战。但是，应该注意到，儒学内部师法家法的传授、今文经古文经在争辩中的相互吸收以及玄学思想和佛学思想对儒学的影响和浸透，在客观上也为唐初融会百家学说，统一儒学教育思想创造了思想条件和历史条件。

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玄学和佛学思想对儒学的冲击。魏晋南北朝时期，统一的国家分裂为众多的政权并存的局面，形成了社会思想的多元化格局。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社会思潮，主要表现是用老、庄之说注释儒经及诸子之书。一般来讲，玄学家大多较推崇孔子，注意将孔子和老子以及道家的无为与封建伦理观念结合起来，提倡玄儒融合，以玄学来改造儒学。但是，玄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儒家教育思想是有冲突的，“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以及后来的鲍敬言等人，曾对儒家思想予以猛烈批判。他们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否定儒家纲常伦理教育，否定六经教育等思想，表现了对儒学思想的批判。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魏晋南北朝是第一次大发展时期，也是佛学与玄学合流时期。北方统治者缺乏儒学传统和玄学修养，当大乘佛教传入后，便被当做精神支柱。十六国时期，后赵的石虎认为佛是军神，应加以供奉。后秦的统治者姚兴大崇佛教，请僧人鸠摩罗什入长安译经。北魏拓跋氏政权既兴儒，又崇佛，力图儒佛并用。但是北朝统治者多为少数民族，文化修养较弱，注重的只是佛教的修行（戒律、禅法），佛教理论则随着僧人和北方士族的南迁而在南朝得到发展。佛教的兴盛给儒家教育造成新的挑战，佛教对儒家礼法教育的否定，涅槃佛性学说的流行，使佛教中的一些思想和观念与儒家传统教育中宣扬的内容有极大的矛盾，这无疑是对儒家天命理论的沉重打击。

第二，多元化教育制度。从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几百年中，儒学一直是国家唯一的政治学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的多元化，汉代经学思想的衰颓，玄学和佛教思想的冲击，教育已不再是儒家的特权，玄学和佛教开始进入教育这一儒家的世袭领地，教育制度呈现出多元化局面。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在京师兴设了“四学馆”。这“四学馆”，一所是儒学馆，一所是文学馆，一所是史学馆，一所是玄学馆。主持儒学馆的

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极重的雷次宗，他是名僧慧远的学生。主持玄学馆的何尚之更是一个举家信佛、世代信佛的人，他代表了当时信奉佛教的封建士人，自然也培养了一批具有玄学知识和佛学知识的人。玄学馆的设立是佛教（也包括玄学）对儒学教育的直接冲击，以往在教育领域中儒学独尊的局面已被打破，佛教和玄学堂而皇之地步入教育这一神圣的殿堂。

第三，各民族教育大融合。各民族教育的大融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的重要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具有高度的封建文化，而北方少数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制社会阶段。在民族大融合的同时，北方各少数民族认识到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接受汉族高度发展的教育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汉化的同时，教育也必须汉化。通过一系列的汉化教育工作，各民族实现了教育大融合，基本上填平了鸿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民族文化知识水准间的距离，培养出一大批具有高度文化教育素养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学者和文人。在汉化教育过程中，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重视儒家经学，同样尊崇孔子，接受和实施孔子及其儒家的教育思想。

隋唐统治者为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使之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隋代统治者在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进行了教育制度的改革，努力建立能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在制度化建设的同时，隋代统治者主张南北经学的统一，致力于消除南北经学融合的障碍，对唐代尊圣崇儒文教政策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前提条件。李渊父子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后，面对隋王朝的废墟，需要用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在教育上，也同样面临着用儒家的文教政策来建立一套新的教育制度的任务。然而，汉魏以后，儒学内部的矛盾斗争以及玄学、佛教对儒学的冲击，造成了儒学教育的衰落和思想上的混

乱，无法以统一的整体来为封建政治服务。面对这种局面，李渊父子便着手改革儒学教育。李渊恢复了隋代的教育制度并有所创新，多次颁布诏书以尊崇儒学和发展教育。李世民确立了崇圣尊儒的文教政策，并以此指导教育制度的建立。自崇圣尊儒的文教政策确立后，虽然有过唐高宗的“薄于儒术”和武则天的摧残教育，以及中唐以后官学的衰落，但终有唐一代，这一文教政策始终是国家教育的指导政策。

崇圣尊儒的文教政策在唐代教育制度的建设中起了 5 个方面的作用：

其一，在教育目的上，崇圣尊儒的文教政策要求培养和造就儒学人才，因而大力发展经学教育。

其二，在教育内容上，统一了汉代以后纷纭各异的师法、家法，实现了儒家文教政策的整体化，建立了唐代新儒学。从贞观开始，唐代统治者就致力于儒学教育内容的统一，从颜师古到孔颖达，最后到长孙无忌，这一过程长达 20 年。以《五经正义》为标志的唐代新儒学有几个特点：儒学为政治之本；立圣人之教的教学法则；强化礼制教育；融会百家，儒学为宗。

其三，在教育制度上，将教育与政治相统一，使教育制度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其四，在崇圣方面，唐代统治者极力抬高孔子的地位，在教育领域中树立了孔子的独尊地位，建立了儒家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道统”，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从武德到开元，中央及地方学校皆立孔子庙，春秋释奠。同时，孔子的地位不断被抬高，达到帝王（文宣王）的尊荣。唐代统治者将孔子偶像化、神圣化，强烈地表现出施儒家之教、行儒家之政的政治目的，表明教育与政治的结合和为政治服务的作用。同时，在向学生进行教育的同时，向社会施行儒家的教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其五，在尊儒方面，大力兴办学校，延聘名师硕儒为学官。同时，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将师道尊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崇圣尊儒的文教政策是对汉晋南北朝以来儒家文教政策的一次大整理、大总结和大统一，结束了 400 年来儒家思想上的大混乱、大动荡的局面，反映了唐朝大一统封建帝国的政治需要，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和意义。

隋唐时期健全和完善了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强烈地表现出教育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结合。隋唐统治者建立了以礼部为中心的集权管理教育制度。无论是国子监各学校，还是唐代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学生入学和毕业都由礼部统一管理；州县学生升入四门学，亦需经由礼部批准；礼部的祠部司管理职业教育（天文学、占卜学、兽医学等）。另一方面，礼部规定统一的科举考试内容，天下官私学生皆须修习统一的教材，从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培养方式上，将全国教育统一在集权化的教育制度中。从武德到天宝年间，中央和地方的教育制度经历了创立、健全、调整和完善几个阶段。在中央，既有贵族学校，也有国子监的六学一馆；在地方，建立了州县乡里四级制教育制度。无论是中央学校，还是地方学校，都归礼部管理，表现了教育上的中央集权性。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以及隋代，地方教育虽亦有规模，但由于养士教育与取士制度的不谐调，始终未能真正成为国家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唐代统治者采用了州县学生升中央学校的补阙升级制和科举取士的方法，理顺了地方教育与中央教育的关系，将地方教育制度纳入了国家教育制度之中，使地方教育制度成为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学、实科、职业三大教育系统，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网络。实科成为唐代教育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反映了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生活对实科教育的需求。职业教育具有行政、教学和科研三结合性质，同时也展现了古代科学知识和技术

水平。私学教育制度纳入国家教育制度，这在中国教育制度史上是第一次。汉代的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矛盾斗争，也表现为官学和私学的矛盾斗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学的衰落、教育制度与取士制度的不统一以及家学的发达，官私学之间的矛盾始终未能解决。唐代统治者采用了两种方法解决了这一长达千年的矛盾。其一，颁定官方教材，统一教育内容，官私学生都必须按照国家颁定的统一教材进行学习。其二，大力推行科举制，使科举考试成为官私学生人仕的共同途径。从《登科记考》和金石墓志中发现，盛唐以后科举及第者大多数为私学乡贡，说明私学教育制度在唐代纳入了国家教育制度的轨道，与官学教育制度一道成为国家教育制度的支柱。自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科取士以来，书生士子不论门第高下皆可凭自己的才学博取入仕资格。但是，科举制成为国家主要取士制度的成熟和健全的主要标志，是与教育制度紧密结合，解决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养士与取士不统一这一巨大矛盾。开元二十四年（736 年），李权事件引发了教育制度上的大改革，科举管理权由吏部移到礼部，使礼部作为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对教育和科举既统一管理，又双向调节，实现了培养目标和考查方式的统一与结合。

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唐代是第一个将道德教育内容制度化的王朝。在唐代教育制度中，道德教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必须修习这门课程。《孝经》和《论语》是道德教育的基本教材，武则天时，《老子》也成为道德教育的内容之一，形成儒道合流的道德教育思想。《孝经》和《论语》是儒家思想的道德规范，是汉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传统的精神支柱；《老子》以清静无为而治国治民，是唐初诸帝的政治之术。二者结合，反映了政治上的统一性和教育内容上的兼容并蓄。道德教育内容制度化的另一方面,是科举制度中规定《孝经》、《论语》、《老子》为必考课目，

保证了道德教育的普及化和制度化。在隋唐官学教育制度中，官学学生的入学制度表现了强烈的封建等级观念。唐代官学分为 6 种不同等级的学校：弘文馆，崇文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书、算学；州县学；职业教育学校。弘文馆和崇文馆是贵族学校，国子学是公侯学校，太学是卿大夫学校，什么品级官员的子孙入相应等级的学校，制度严格，界线分明，执行严密。然而，隋唐官学教育制度中官学身份等级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门阀封建等级观念有很大区别。魏晋南北朝的封建等级观念表现的是门阀世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综合特权，而唐代的封建等级入学制度不论门第，只论官职的高低；魏晋南北朝时期“下品无世族，上品无寒门”，隋唐官学的生徒则按其父祖官品入学，并不需要区分门第的高下。因而隋唐官学教育虽然在制度上表现了封建官员的政治特权，但这种特权比较于魏晋南北朝，已经失去了经济上的意义，表明教育的权益在隋唐相对的扩大化。唐代前期，除教师薪俸中的禄米外，教育经费基本上出自国家财政预算外收入。唐高宗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使唐政府财政收入大为增加，中央学校教师的俸料首先实现了国家财政一体化。开元时，经济的增长和财税收入的增加，使地方教师的俸料也从国家财政预算内支付。此外，国家勘定各级各类学校的公廨钱和食利本钱，由户部追加和划拨，从而使教育经费成为国家财政预算的组成部分，表现了唐代税目、税率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说明经济为教育提供了物质保障。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由统一到分裂，又在新的基础上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在这个社会历史时期，中国教育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儒家传统的神圣教育领地被打破，佛教、玄学和道教进入了教育领域。在民族大融合的同时，文化教育也进行着大融合，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隋唐统治者在改造儒学、确立儒家政治思想的同

时，实施了崇圣尊儒的文教政策，建立了系统的教育体制和比较完善、严格的教育制度，开创了灿烂辉煌的时代，为后世封建王朝的教育制度立下了稽式和楷模。

本卷第三编由王建军教授撰著，第四编由宋大川博士撰著，其中第六章由河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刘虹教授撰著。在撰著过程中，我们参考和吸收了学术界尤其教育史学界前辈和时贤的研究成果，在此谨表谢忱。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文教政策的调整

文教政策的调整，实质上是对教育发展方向的重新选择。随着汉王朝的解体，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也因之发生动摇，重新选择教育发展方向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提出来了。但是，魏晋南北朝各政权的统治者乃至封建士大夫，并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教育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也没有具备进行目标明确、措施得力的教育体制改革的意识，在各政权颁布的兴学诏令中，依然还是崇儒读经的传统老调。这说明了传统教育价值观念根基深厚。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才促使各政权统治者在教育方面采取了一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举措。这在客观上促成了文教政策的调整，体现了教育发展方向的新选择。从魏晋南北朝文教政策调整的总趋势来看，由独尊儒术的单一格局走向了多思潮并存的多元格局。这种多元格局主要体现为下列方面。首先，由于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差异，各割据政权采取了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教政策，从而呈现出多元特征。其次，玄学的流行，佛教的兴盛，道教的生长，终于导致突破了儒学独霸的单一格局,形成了儒、佛、玄、道并存的局面。又由于魏晋南北朝的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对这些思潮的态度和认识不尽相同，也带来了各政权文教政策的差异性。再次，因各个时期文化的相互交融程度有异,导致了文教政策的层次差异。例如,同是‘ 汉化 ’政策,十六国政权与北魏就处在不同层次 同是儒、佛、道并存,南朝和北朝的看法就有差异。这种多元格局的形成，表明整个魏晋南北朝对教育发展方

向的选择始终是处于反思探索的状态中。这种反思探索对封建社会文教政策的调整，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第一节　三国时期的文教政策

一、三国当权者的教育追求

董卓乱后，天下分崩，各路军阀拥兵割据。曹操统一北方，刘备占据西蜀，孙权自立江东，天下三分态势形成。公元 220 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国号魏，立都洛阳。次年，刘备称帝于成都，国号蜀。222 年，孙权自称吴王。史称三国。

东汉政权的垮台，给当时社会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便是独尊儒术思想文化结构的解体。而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又为社会思潮的多元并存留下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三国志》卷十六《杜畿传》中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晋书》卷四七《傅玄传》中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 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宋书》卷五五《臧焘传》中说"：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足可见当时思想活跃的景况。或许是因为整个社会长期受独尊儒术政策的束缚而终于得到了一次充分释放的机会，《梁书》卷四八《儒林传序》中用了" 中原横溃，衣冠殄尽 " 8 个字来形容当时儒学从独尊的宝座上跌落下来的惨状。

这些思潮的流行直接影响了三国早期当权者的教育观。虽然曹操、刘备、诸葛亮、孙权等人身处戎马倥偬、干戈未已之时，无暇顾及教育，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运用法治手段来整顿社会，加强国力，但治国终归离不开教育，也回避不了对教育传统的评价。汉代教育所推崇的章句之学，所流行的枝叶蕃滋、具文饰说的学风，所助长的浮华相尚、盗窃虚名的社会风气，与他们所推崇的法治主张相去甚远，

因而他们对独尊儒术的教育模式不可能不表达自己的意向或意见。

曹操是崇尚法术的，但他并非完全否定名教。他生活在儒学相当发达的中原地区，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学的熏陶和影响。面对乱世，他固然主要是依靠法治手段来稳定社会秩序，但也常常思虑应该如何辅之以教育手段。东汉建安七年（202 年）正月，曹操发布命令：“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① 这是曹操关怀手下将士而下的一道命令。对抚恤将士后代，他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授田并官给耕牛，二是置学师以教之。这两个要求能否兑现，另当别论。但曹操的这个思想正是儒家“庶富教”主张的体现。第二年七月，曹操发布了设立地方学官的命令，这也是曹操发布的惟一关于教育的命令。令曰：

> 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②

因伤感于社会风尚的颓废而思考着教育的重构，说明在曹操的治国方略中教育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但曹操生前并未着手于教育重构。忙于战争，固然是其主要原因，对独尊儒术教育模式的迷茫，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要重建教育，首先须回答的问题便是要重建什么样的教育。前车之鉴，只有独尊儒术的教育模式。而这一模式所培养的人才为当时人所不齿，也为曹操所不信任。曹操所颁布的 4 个求贤令，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人才观与汉代章句之儒是格格不入的。其所谓“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所谓‘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正表

①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明了他在新的教育选择面前的举棋不定。如果于仓促间草率恢复读经教育，势必与他的选才原则相抵牾，使人无所适从。况且，曹操本人的学习追求也绝对不是章句之学。曹操早年“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①，史家称其“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②，这么广泛的学习追求，正可见曹操的学习观与独尊儒术教育模式的不相一致。

诸葛亮治蜀，主张循名责实，主张去文就质，主张借法治的力量来推行教化。诸葛亮指出：“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③ 这种教育观主要来自于先秦法家的教育思想，而与儒家教育观相去甚远。特别是针对两汉教育所导致的名实不符、上下乖张的弊端，诸葛亮的这个教育主张显然是一种新的选择。一次晋武帝向樊建询问诸葛亮的治国效果，樊建用了 16 个字来概括：“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④ 而史家在评传中对此的评语是：“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⑤

至于诸葛亮的读书观点，则可以从刘备给儿子刘禅的遗书中窥见。刘备在遗书中要求刘禅：“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⑥ 刘备所列书目重在法

①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异同杂语》，《魏书》。
③ 《诸葛亮集》卷一《便宜十六策·治人》。
④ 《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⑤ 《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⑥ 《诸葛亮集》附录卷一。

家理论和历史知识，诸葛亮主动为刘禅抄录这些书籍，说明他也是赞同这一主张的。

东吴的孙权也是如此。他成长于军旅之间，崇尚法治，对儒家那一套东西不怎么感兴趣。史书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孙权未行郊祀，群臣奏议“宜修郊祀，以承天意”，但孙权不肯。如此反复再三，群臣不得已搬出记载有当年匡衡对这一问题的主张的经典加以奏劝，孙权则索性说：“经传无明文，匡衡俗儒意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也。”① 这近乎蛮不讲理的态度，说明孙权对儒家的繁琐礼节颇为反感。这种态度与当时轻视儒学的社会思潮是相吻合的。

但孙权并不是个不读书的人。有一次，赵咨奉命出使魏国，魏文帝带着嘲笑的口吻问道：“吴王颇知学乎？”赵咨回答说：“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② 赵咨身为使臣，为人主说话不免有溢美之辞，但对孙权读书观的介绍还是很客观的。孙权读书的兴趣在历史方面，这是结合他的统治需要而选择的，即学为所用。在学习方法上是“历史籍，采奇异”而不是“寻章摘句”，意在撷取前人的兵谋奇策以借鉴历史经验而不拘泥于死背章句。孙权的读书观，说明他对汉代独尊儒术教育模式是极不信任的，也说明他对教育改革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孙权与吕蒙、蒋钦的一次谈话，也证实了这一点。孙权对他们两人说：“卿今并当途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吕蒙想找个借口推脱：“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

① 《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② 《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注引《吴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